

周风芮韵 多姿吉金

韩城芮国墓地 M26 出土微型铜器鉴赏

杜阳光 方琦

近年来,两周封国考古工作持续推进,收获颇丰。陕西澄城刘家洼墓地、韩城陶渠“京”邑墓地,以及山西北鹤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断为我们揭开古代文明的神秘面纱。在这些墓地出土的文物中,一类形制精巧、制作细腻的微型铜器格外引人注目,如方盒、小罐。它们虽无庙堂重器的庄严肃穆,却以独特的玲珑姿态自成一格,成为考古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其功用及器内残留物分析,更是备受关注。2006年在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 M26 出土了 6 件微型铜器,近 20 年来相关研究论著层出不穷,为深入了解这类器物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积累。

此组微型铜器(图 1)出土于梁带村 M26 芮姜墓外棺东侧偏北处,包含镂空方盒、套鼎、匱、贯耳罐、钺和单把罐,保存状态完好。

镂空方盒(图 2)由盒身和下部四小兽足构成,通高 10.9 厘米、通长 16.9 厘米,盒身长 14 厘米、宽 11 厘米,盖高 2.5 厘米,足高 2.8 厘米。盒盖为平顶,四周呈斜坡状。盒身四壁呈镂空状,下部兽足为爬虎造型,前后肢间装有小轮,小轮与虎身因锈蚀粘连在一起,无法转动。四只爬虎均安置在盒体长边一侧,与盒壁垂直,同一侧的两只虎尾部相对,虎首均朝向盒体外侧。器盖顶部台面饰有孔有珠重环纹,共三排,每排两环三珠,上下两排的珠、环皆为镂空设计,中间一排仅环为镂空,珠用阴线表示。斜坡面装饰三周重环纹,中间一排环、珠均为镂空,其余两排重环纹用阴线表示。四周还有用阴线表示的菱形纹饰。盒体每一侧面采用透空镂雕的形式表现龙纹,共 4 组,龙纹对称并列,相互缠绕。盖体下的四只爬虎用阴线表现四肢,虎尾上卷。推测原本可能有木质盒身,现已腐朽无存。

此方盒最精彩的部位当属盒底的四只爬虎造型,栩栩如生。虎身下部的四个轮子均为实心车轮,无轮辐。有学者曾撰文对周代有轮铜方盒造型进行探讨,指出四轮马车从公元前 4500 年左右开始出现于欧亚草原西部地区,一直延续到公元前后,并且经历了从实心车轮到少辐条式车轮,再到多辐条式车轮的演变过程,并认为中国四轮车的造型可能来自欧亚草原西部及其以西的文化,其传入国内与丝绸之路之上的文化交流密切相关。有轮方盒的长方体盒身可能象征了马车的车舆,其纹饰是西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典型纹饰,盒上附铸动物与人物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装饰技法。

长期以来,关于该方盒的功用颇具争议。李零先生认为这类方盒可用于盛装玉器,或者说是“珠宝盒”。方辉先生对不同形制的方盒进行分类,认为此类器物是“首饰

盒”。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12 曾出土一件小铜罐,因罐内残存脂粉被认为是化妆品盒。山西北鹤墓地 M4 出土的铜盒内有大量带有颜色的残留物,并且在提取土样时发现了一件铜勺,由此推测铜勺是用来舀取盒内膏状或粉状化妆品的,它应是和铜盒配套使用。由此可见,此类铜方盒用途并不单一,其功用或是放置珍宝玩物,或是放置首饰、化妆品,抑或兼而有之,还有待于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

套鼎(图 3)是大鼎内合铸一小鼎,通高 10.3 厘米、通长 11.5 厘米,大鼎口径长 10 厘米、宽 8.4 厘米,小鼎口径长 5.9 厘米、宽 4.8 厘米。大小鼎均为方鼎,三敞口,平折沿,方唇,附耳,直腹,平底。小鼎鼎足为瑞兽,呈跪立状背负鼎身;大鼎鼎足为裸体女性奴隶,呈跪立状背负鼎身。小鼎器身纹饰因器形原因无法看清;大鼎器身上部饰窃曲纹,下部饰重环纹,底部正中有四个等距离分布的呈矩形状或圆形形状的铸接痕迹。此件方鼎形态属商式风格,大小鼎铸接在一起,极为少见。

值得注意的是,四位作为承重器足的奴隶形象逼真。毕经纬先生认为,商至西周时期的青铜奴隶形体普遍较小,造型以蹲、跪为主,双手多作背负状,多作为盘、盂、鬲等容器的器足或器物的附属装饰,其身份应是从事劳动的奴隶、仆从、俘虜等地位低下之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在铸造青铜器时,除了延续先前神神兽鬼纹饰造型外,已逐渐转向世俗化的主题演变,礼乐等级气息浓郁。

铜匱(图 4),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构成,通高 10.5 厘米,口径 8.4 厘米、腹深 4.7 厘米,圈足高 1.9 厘米。器盖呈隆起状,中部设有人面兽身钮,兽尾卷曲。盖面装饰四个凸起的卷云纹。器盖后部置半环形钮,与器身后部的半环形钮通过“8”字形铜系相连。器身前端伸出兽首槽形流,前端沿下有舌形遮板与兽首相连,形成流口遮盖结构。器体鼓腹、平底,下承圈足,两侧附龙形双耳。口沿下装饰一周四个“S”形窃曲纹,其下有一周素面条带。龙形双耳顶部的龙首呈平板状直立,体呈半环形,龙尾上卷。圈足足面分布 6 个三角形镂孔。

考古报告中将此器定名为“匱”,高西省先生指出,该器主体造型完全符合西北地区草原文化铜匱的典型特征,而带盖设计则具有山西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铜鼎带流有盖的工艺特点,并以典型的周人传统纹样与铜匱造型巧妙结合,形成了明显具有异域文化特色的风格。由于此器的造型和功能与作为水器的铜匱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定名为“铜匱”并不恰当,建议改称“带流匱形器”。

值得一提的是,器盖内壁留存有结晶状残留物,经科技考古检测分析,确认为迄今为止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合成铅白化妆品,将我国铅白的使用历史提前至春秋早期,为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和手工业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贯耳罐(图 5),通高 10.8 厘米,口径 8.1 厘米、底径 7.5 厘米。盖面呈弧隆状,母口略向外敞。器身子口内敛,鼓腹平底,高圈足。盖口沿两侧对称设有贯耳,与器身两侧的耳孔上下贯通。器盖饰重环纹,器身上部饰窃曲纹,下部及圈足则以垂鳞纹为饰。

李零先生依据虢国墓地出土梁姬姬的铭文考证,指出包括芮国墓地所出贯耳罐在内的同类铜质小罐,应定名为“匱”。这一观点渐为学界所接受。孙戈伟先生通过对出土铜匱的墓葬统计分析,得出该类器物仅流行于贵族阶层,且主要使用者为拥有三鼎以上配置的高级贵族。这件贯耳罐颇具巧思,器身与器盖通过贯耳可以用丝带或绳子穿系固定,这种设计既确保了盖体与器身的连接稳固,又便于提携。尤为重要的是,盖内留存的白色残留物经检测为人造铅白。这一发现确凿证实了该贯耳罐当为盛装化妆品的容器。

铜钺(图 6),通高 6.6 厘米,口径 6.5 厘米、腹深 4 厘米,圈足直径 4.5 厘米、高 1.6 厘米。方唇、侈口、弧腹、平底,喇叭状圈足。唇缘对称分布半环形耳,耳顶饰圆形乳钉。上腹部饰一周龙纹,每组均为上下对称的回首龙首,杏核眼、翘鼻、吐长舌,身躯细长,龙尾相交处有一圆目,暗示叠压着另一条龙。

该铜钺所见的人龙交合纹样极富特色,多见于关中地区西周的佩玉上,显然是将玉器上的纹样移植到了铜器上。事实上,关中地区此前发现的铜钺多为深腹、圈底圈足,与芮国铜钺纹饰相近的器物几乎没有。钺是北方草原文化的典型代表器,主要分布在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地区。以宝鸡岐山出土的一件铜钺为例,其形制与北方草原器物完全一致,且与之同出的还有典型北方釜式短剑,可以确定其是从北方草原地区传过来的。而梁带村出土的铜钺,器身装饰周人传统纹样,推测为芮国本地铸造,标志着草原器型的中原化改造。

单把罐(图 7),通高 6.6 厘米,口径 7.4 厘米、底径 5.1 厘米。侈口尖唇、束颈鼓腹、凹底近平,一侧设桥形耳。桥形耳中带窄小的凹槽。素面无纹,虽是北方草原文化的典型器类,但也屡见于中原地区。一般认为此类器物的年代多处在战国至汉代,芮国墓地 M26 该器的出土对于正确认识其年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坐标。结合同墓出土的镂空方盒、铜钺等器物功能推断,该罐可能用于盛放首饰或小件玉器。

综上所述,芮国墓地出土的这 6 件微型铜器蕴含丰富文化内涵,其名称与功用的考定,对探讨周代礼制变迁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微型铜器虽出自晋陕豫交界地带不同地区的墓葬,且具体放置的物品也不尽相同,但彼此间存在诸多共性,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们大多出土于高等级女性墓葬。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的贵族女性使用者或许因受传统成规束缚相对较少,加之性别差异带来的独特需求,从而催生了有别于常规规格的微型新器制。这些器物不仅是女性贵族身份地位的物质象征,更从细微处折射出古代丧葬制度的发展演变轨迹。

该组微型铜器表面光滑细腻,纹饰线条流畅,精细高超的打磨抛光工艺,不仅提升了器物的美观度,更通过“以小见大”的艺术处理,展现了芮国工匠高超的设计能力与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如今,这组微型铜器集中展示在韩城市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以 2800 余年的历史积淀,展现了周礼文化滋养下的芮国韵味。作为芮国与北方民族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它们既承载着“辨华夷、正名位”的礼制功能,又彰显着“见巧思、品趣味”的工艺美学,为研究周代礼制变迁、女性贵族生活及区域文化互动提供了多维视角。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韩城市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9 虢仲墓出土的玉璧

刘征宇

玉璧,是一种圆形扁平体且中心有孔的玉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璧”曰:“瑞玉,圆器也。”《尔雅·释器》曰:“肉倍好谓之璧”,“肉”是指璧边的宽度,“好”为璧中间的圆孔孔径。

玉璧最早出现于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明清。早期的玉璧,多素面无纹饰,器形简洁。至商代,玉璧出现纹饰装饰,且多为弦纹这一单一元素。周代则是玉璧发展的繁盛时期,此时期的玉璧不仅数量骤增、体型较大,而且质地优良、纹饰复杂,如龙纹、弦纹等。春秋战国至汉代,玉璧纹饰为云纹、谷纹、蒲纹,间或有螭纹。唐、宋、元以后,玉璧又出现了阴刻螭纹、乳钉纹、兽面纹、花鸟纹等装饰。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三门峡虢国墓地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中,清理出 36 件制作精美的玉璧,本文选取国君虢仲墓(M2009)出土的 18 件玉璧简要介绍。

M2009 出土的玉璧

小臣系玉璧(M2009:1011)(图 1)

出自墓主虢仲的右股骨上,出土时器身有一处较长的裂痕。外径 14.9 厘米,孔径 7.1 厘米,厚 0.6 厘米。青白玉,青白色,大部分受沁呈黄褐色,且有少许白色斑点和黑斑。玉质细腻,微透明。圆形,体较厚,断面呈长方形。器身外边缘有竖款铭文,共一行 4 字,即“小臣系献”。此器的制作年代为商代。

刻铭弦纹玉璧(M2009:801)(图 2)

出自棺内殓衾上,出土时璧的两面均粘有朱砂痕迹和大片麻布痕迹。外径 15.1 厘米,孔径 7.1 厘米,厚 0.4 厘米。青玉,豆青色,受沁处有黄褐斑纹和灰白斑。玉质细腻,微透明。圆形,体较薄,外边棱被磨得圆滑,断面呈长方形。器身正、背面纹样相同,皆饰三组凹弦纹,内、外两组各为三道,中间一组为四道。在璧身正面的器孔边缘处刻有铭文,依势环形一行 14 字,即“罕(厥)□于虢若□中□□在□□□□”。此器的制作年代为商代,落入后人之后,铭文曾被刻意抹去,如今能见之者皆是残余部分。

龙纹玉璧(M2009:826)(图 3)

出自棺内殓衾上。外径 19.1 厘米,孔径 7.3 厘米,厚 0.55 厘米。青白玉,青白色,外边缘受沁处有少许黄褐斑。玉质较细,微透明。圆形,体较厚,断面呈长方形。正、背面纹样相同,均饰变形龙纹。器身边缘略有磨损痕迹。

龙纹玉璧(M2009:1027)(图 4)

出自墓主虢仲的腰部下。外径 14.2 厘米,孔径 6.8 厘米,厚 0.4 厘米。青玉,冰青色,大部受沁呈黄褐色。玉质细腻,半透明。圆形,体较薄,正、背面各有一条切割痕,断面呈近长方形。正、背面纹样相同,均饰内外两层变形人龙合雕纹。此器做工精细,线条流畅。

素面大玉璧(M2009:221)(图 5)

出自内棺盖板上,出土时在璧的一面粘有大片丝织品和朱砂痕迹。外径 19.3 厘米,孔径 6 厘米,厚 0.6 厘米。青玉,深豆青色,受沁处有黄白斑和黄褐斑。玉质较细,微透明。圆形,体形较大,且较厚,断面近长方形。

素面大玉璧(M2009:225)(图 6)

出自内棺盖板上,出土时背面保留有红色丝织物痕迹。外径 19.2 厘米,孔径 6.2 厘米,厚 0.4 厘米。青玉,豆青色,局部受沁有棕黄色斑纹。玉质较粗,半透明。器面光洁,圆形,体较薄,断面呈长方形。

素面大玉璧(M2009:940)(图 7)

出自棺内殓衾上,出土时一侧断裂,正、背面有红色丝织物痕迹。外径 16.1 厘米,孔径 6.3 厘米,厚 0.4 厘米。青玉,豆青色,全部受沁呈黄褐色或黄白色。玉质细腻,半透明。圆形,体较薄,断面呈长方形。

素面大玉璧(M2009:223)(图 8)

出自外棺盖板上,出土时璧的正、背两面尚残留有大片的朱砂和丝织物痕迹。外径 15.6 厘米,孔径 6.2 厘米,厚 0.5 厘米。青玉,冰青色,大部受沁呈黄褐色。玉质较细腻,微透明。圆形,体较厚,断面呈长方形。

素面大玉璧(M2009:216)(图 9)

出自内棺盖板上,出土时器身有两道较明显的裂纹。外径 13 厘米,孔径 6.6 厘米,厚 0.5 厘米。青玉,冰青色,受沁处有黄褐斑纹和墨斑。玉质细腻,半透明。圆形,体较厚,正面外边缘有一道切割痕,断面呈长方形。

素面大玉璧(M2009:1026)(图 10)

出自墓主虢仲左侧腰部下,出土时器身有二道裂纹,正、背面有小片的红色丝织物痕迹。外径 14.7 厘米,孔径 7 厘米,厚 0.65 厘米。青玉,深冰青色,局部受沁呈黄褐色,且有棕褐裂痕状沁斑,间杂白色斑点。玉质较细,微透明。圆形,体厚,背面有一道切割痕,断面呈长方形。

素面大玉璧(M2009:1010)(图 11)

出自墓主虢仲右股骨上,器背部有小片的红色丝织物痕迹。外径 12.8 厘米,孔径 6.9 厘米,厚 0.6 厘米。青玉,浅冰青色,全部受沁呈土黄色。玉质较细腻,透明。圆形,体较厚,断面呈长方形。

素面大玉璧(M2009:1028)(图 12)

出自墓主虢仲左侧腰部下。外径 12.7 厘米,孔径 6.7 厘米,厚 0.6 厘米。青玉,冰青色,受沁处有黄褐斑或棕褐斑。玉质较细,微透明。圆形,体较厚,断面呈长方形。

素面大玉璧(M2009:222)(图 13)

出自内棺盖板上,出土时一侧有断裂缝。外径 12.6 厘米,孔径 6.8 厘米,厚 0.3 厘米。青玉,深冰青色,全部受沁呈黄褐色。玉质较粗,微透明。圆形,体薄,断面呈长方形。

素面大玉璧(M2009:1036)(图 14)

出自墓主虢仲盆骨下,出土时器的正、背两面有红色丝织物痕迹。外径 12.6 厘米,孔径 6.1 厘米,厚 0.6 厘米。青玉,深冰青色,受沁处有黄褐斑。玉质细腻,透明。圆形,体较厚,断面近长方形。

素面大玉璧(M2009:829)(图 15)

出自棺内殓衾上,出土时已断为两截。外径 11.5 厘米,孔径 6.4 厘米,厚 0.25 厘米。青白玉,青白色,局部受沁呈土黄色或有黄褐斑。玉质温润细腻,透明。圆形,体薄,断面近长方形。

素面大玉璧(M2009:1037)(图 16)

出自墓主虢仲盆骨下,出土时已断为三截。外径 11 厘米,孔径 6.6 厘米,厚 0.6 厘米。青玉,浅冰青色,受沁处有黄褐斑纹或斑点。玉质细腻,透明。圆形,体较厚,断面呈长方形。

素面小玉璧(M2009:866)(图 17)

出自棺内殓衾上。外径 5 厘米,孔径 1.9 厘米,厚 0.6 厘米。青玉,冰青色,受沁有浅黄色斑纹。玉质细腻,微透明。圆形,体较厚,正面微鼓,背面平,正面略小于背面,穿孔偏向一侧,断面呈五边形。

素面小玉璧(M2009:573)(图 18)

出自内棺盖板上。外径 3.2×3.3 厘米,孔径 1.3×1.7 厘米,厚 0.6 厘米。青玉,浅冰青色,因受沁有许多黄色斑点。玉质细腻,半透明。近椭圆形,体较厚,正面微鼓,背面平,正面略小于



背面,穿孔偏向一侧,断面呈四边形。

玉璧的功能

商代以前的玉璧充满神秘色彩,主要被用作礼器和葬玉。到西周时期,玉璧的用途则变得较为广泛,这时期的玉璧不仅被用于礼器,而且也用于佩戴,同时亦作为随葬品或社会交往中的馈赠品或信物。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三门峡虢国墓地发掘出土玉璧情况,玉璧主要有以下五种功能。

一是玉璧被古代贵族用作祭器和礼器。玉璧作为礼玉“六器”之一,担负着祭天、祭祖、事鬼神的重大宗教责任,是礼玉中最为重要的核心玉器。如《周礼·春官·大司马》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可见,玉璧不仅是礼玉之首,而且经常出现在重要的国家祭祀大典中,主要用于祭礼上天。

二是玉璧用作随葬品。从考古发现看,玉璧是古代帝王和高级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如虢国墓地 M2009 虢仲墓随葬的玉璧,主要放置在墓主虢仲的胸部、背部以及棺内,其功能是用来祈愿尸身不腐。

三是玉璧作佩戴之用。玉璧作为佩玉,古代称之为系璧。许慎《说文解字》释“玮”云:“石之次玉为系璧。”《周礼》亦有“子执古璧,男执蒲璧”的记载。如前述 M2009 出土的素面小玉璧,应是作为佩戴的装饰品。

四是玉璧用作信物和馈赠品。在古代社会交往中,因玉璧具有极高的价值属性,故常被用作信物和馈赠品。如《荀子·大略》记载:“问士以璧,召人以瑗。”就是指用玉璧作为瑞信和凭证,表达相见之礼。

五是玉璧被用作古代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三门峡虢国墓地发现的 36 件玉璧,分别出自 M2001、M2009、M2011 和 M2012 四座墓,其中 M2001 出土 12 件,M2009 出土 18 件,M2011 出土 1 件,M2012 出土 5 件。M2001 墓主虢季和 M2009 墓主虢仲均为虢国国君,M2012 墓主梁姬为虢季之夫人,M2011 墓主为虢国太子,他们皆为当时虢国最高等级的贵族。由此可见,此时期的玉璧不仅是礼器,也是财富、权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作者单位:三门峡市仰韶文化研究中心)